

里约之新



里约+20
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会议

LI YUE ZHI XIN



——国际可持续发展新格局、新问题、新对策

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 编



人民邮电出版社
POSTS & TELECOM PRESS

里约之新



里约+20
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会议

LI YUE ZHI XIN

——国际可持续发展新格局、新问题、新对策

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 编

人民邮电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里约之新：国际可持续发展新格局、新问题、新对策 / 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编. —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7-115-29076-2

I. ①里… II. ①中… III. ①可持续发展—研究—世界 IV. ①X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69434号

里约之新

——国际可持续发展新格局、新问题、新对策

-
- ◆ 编 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
责任编辑 李 强
 - ◆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崇文区夕照寺街14号
邮编 100061 电子邮件 315@ptpress.com.cn
网址 <http://www.ptpress.com.cn>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13.25 2012年8月第1版
字数：246千字 201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978-7-115-29076-2

定价：48.00 元

读者服务热线：(010) 67132692 印装质量热线：(010) 67129223
反盗版热线：(010) 67171154



前 言



举世瞩目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又称“里约+20”)于2012年6月20—22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围绕大会的召开,各国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在里约热内卢举行了一系列交流活动,以求利用联合国磋商机制和舆论平台,反映各国、各阶层的诉求。会议在各利益集团和各阶层代表的磋商、较力和讨价还价中结束,并通过了成果文件《我们希望的未来》。

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是具有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咨商地位,并在国内可持续发展领域最具重要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在大会期间联合相关非政府组织,动员了一批专家、学者、企业家积极参与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的各项活动,开展了多场学术研讨和交流活动,代表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发出自己的声音,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会议结束后,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立即组织与会专家、学者、企业家,对大会之后的国际可持续发展格局的新变化、产生的新问题以及我国应采取的新对策进行了研究分析。为了尽快让大家了解可持续发展大会上各国政要和非政府组织对国际可持续发展目标、远景、承诺等重要问题的认识和姿态,以及对国际可持续发展产生的影响,我们组织各领域专家站在不同的视角,谈了自己的认识和看法,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本书将集中反映这些专家、学者、企业家的最新学术思想和观点,供大家参考。

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秘书处

2012年7月18日

目 录

关于“里约+20”会议的对策建议	
陈 健	1
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方略看待“里约+20”峰会	
章新胜	7
“里约+20”峰会后全球绿色低碳发展趋势及我国对策	
何建坤	11
全球实施《21 世纪议程》的主要进展与趋势	
郭日生	16
“里约+20”峰会后的中国立场与对策	
周大地	28
超越“里约+20”：启动新的绿色转型进程与行动	
——“里约+20”大会的观察、思考与建议	
王 毅 于宏源	34
国家能力建设和国际合作	
黄浩明 戴毓容	42
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成就、面临的突出挑战以及应对策略	
彭斯震	60
略论当今国际可持续发展的新格局	
张海滨	65
“里约+20”的基本情况及对有关问题的思考	
孙新章	72
对“里约+20”成果文件中关于绿色经济的解读	
曾贤刚	78
审视“里约+20”	
李正图	89
中国绿色经济发展下的合同能源管理推广机制	
魏 东 聂利彬 牛玉斌	100

从治理层面分析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	
于宏源	110
科技文化双轮驱动引领转型绿色发展	
王亚迅	118
着力消灾减贫 推动绿色发展	
——毛集创建国家可持续发展示范区的实践	
孙仰法 李正图	128
脱贫致富的生态循环农业是最大的绿色经济	
——“里约+20”峰会的绿色期待与梦想	
陈光辉	139
“里约+20”对产业经济的影响	
邓继海 辛小光	146
“里约+20”是历史新起点	
崔大鹏	151
中国国际生态城市建设与推广	
——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	
杨楠	156
创新绿色金融机制,促进绿色经济发展	
——参加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有感	
唐金龙	161
浅析可持续发展的现状和对策	
谢利斌	171
附录	
一、中国 NGO 关于推动扶贫与可持续发展的倡议书	177
二、《我们希望的未来》	178

关于“里约+20”会议的对策建议

陈 健

（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

【摘要】可持续发展这一观念从 1992 年的环境发展大会上确立至今取得了一些进展和成就，但同时也面临着挑战。借着“里约+20”会议的契机，我们应担当积极而有分寸的推动者，推动会议达成一个积极的符合中国利益和世界公益的协议。

一、联合国这次会议的形势

今年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是年内将举行的一届重要的首脑会议。它的别名是“里约+20”，意思是继 1992 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之后，审议 20 年间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和迄今面临的挑战。又有人把会议称为“斯德哥尔摩+40”，将这次会议与联合国 1972 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历史上第一次环境大会联系起来。可持续发展这一观念是在 1992 年的环境发展大会上确立起来的。20 年间，人们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应该说取得了一些进展，成就还是有的。

1. 观念方面。第一个成就就是可持续发展这个观念已经被普遍接受。这个概念刚开始提出来的时候是不乏反对的，曾经被发展中国家认为是发达国家用来约束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一个“陷阱”，现在这个概念经过调整、充实后，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一些国家已经把可持续发展纳入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范畴，像中国已经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项重要的国策。

2. 技术层面。应该说环境友好型的技术，这 20 年有了很大的发展，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有了突破，所以有现成的技术可以让我们进一步推进这个事业。

3. 能力建设方面。在国际层面、地区层面、国家层面都有所加强，中国是最明显了。我们参加斯德哥尔摩的时候，连环境保护是什么意思都不懂，我曾经开玩笑地说，我去参加斯德哥尔摩会议的时候，认为环境保护就是大扫除，我们每个礼拜都要有半天大扫除。回来以后，中国这样的国家开始设立了环境保护部门，现在发改委把整个可持续发展统筹起来。以上这些都说明国际社会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和成就。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艰巨的挑战：人口的挑战、粮食危机、金融危机、水资源制约、气候变暖等。有人说当今世界面临四大危机——经济社会危机、气候变化危机、人口环境资源极限的危机、社会道德伦理的危机。特别是就这次会议而言确实“生不逢时”，举办这次会议时正值西方世界普遍陷入经济衰退、主要关心增长的问题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次会议能不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应该说是打上一个问号的，需要国际社会做出坚决的努力来推动这次会议取得一定的成绩。同时也要防止在会议不可能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甚至破裂的情况下，谁承担责任这样一种国际上的舆论战。

会议要规划人类就今后在下一个 20 年间的活动，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绝非易事，更何况不像 1972 年、1992 年的会议南北双方阵线分明。此次北方内部以欧盟为一方，以美、加、日等为一方对会议有不同的企求。南方内部，非洲国家、岛国、新兴经济体等处境不同、诉求各异。各方矛盾错综复杂是会议召开的又一挑战。

中国参加这次会议的地位和作用怎么样？应该说我们参加这次会议，机遇和挑战并存。因为中国所处的地位与过去不同了，我们与会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都“与时俱进”了。

从机遇方面来说的确是这样，相对于前两次我们参加联合国两个环境会议，应该说我们中国参加这次会议所处的地位是相当有利的。我们参加第一次斯德哥尔摩会议时，基本是打政治牌，在大气层的核试验上与多数国家对立。到里约会议的时候，我们是坚决地要在可持续的发展前面加上“限制”，要把“持续的发展”放在突出的位置，可持续的发展放在次要的位置，凡是出现“可持续的”字眼，我们中国代表团就在前面加一个字“持续的”，意思是先有持续发展，才有可持续的发展。

我们参加这次会议，处境就优越多了，从观念上来说，可持续发展已经纳入我们的基本国策，所以我们在理念上与会议的大方向没有冲突。

在实践上，我们这几年环保领域的实践取得很大成就，在会议倡导的绿色经济领域所包括的好多内涵（如消除贫困、环境保护、可再生能源等）、好多领域我们都是领先的。所以我们从理论到实践方面，在发展中国家中是领先的，好多方面与发达国家比，我们落后也不是很多。所以我们处在一个可以在会议上发挥比较大的作用的一个时候，这是讲机遇方面。

挑战方面也应该说是空前的。自 2005 年起我们连续超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是世界第一，人们普遍预测我们将在今后 20 年内 GDP 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所以我们来自两方面的压力应该说

是空前的：一方面，我们应该做出贡献；另一方面要承担责任，所以无论是“中国责任论”还是“中国贡献论”，在这次会议上都会比较突出。

如处置不当，我们将“腹背受敌”，更何况“里约+20”的目标是要设计今后20年国际社会应对可持续发展的挑战。而这20年恰恰是我国从一个发展中国家向中低收入发达国家迈进的转折时期。国际上反对这一转变的“合理预期”将会要求我们承担更多责任，做出更大贡献。

二、我们的对策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参加这次会议，不能输理，也不能输利，应该说有相当大的难度。“理”不输人，我们要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但是，我们的实际利益也不能有任何根本的损害。要兼顾“理”和“利”的关系，始终处在道义制高点，这是我们这次会议上最难处理的问题，处理得好，的确是机遇大于挑战。

鉴于此，我认为我们在会议上总的姿态应该是积极而有分寸的推动者。现在我们中国发展到了这个阶段，使得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作为一个积极的但是有分寸的推动者，推动会议达成一个积极的符合中国利益和世界公益的协议。

这里我想谈三点。

1. 对于会议达成的成果，我们既要考虑自身当前的承受能力，也要考虑我们发展了以后的承受能力，两个结合起来。因为只考虑我们当前的承受能力，那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不应承担任何超越发展中国家地位的义务，但是考虑到这个会议的成果要管今后20年，我们也要考虑到今后20年我们的发展所带来的成果。所以把这两个结合起来，使得我们承担的义务或作出的贡献，既是我们当前可以承受的，而且随着我们的发展也是可以相应增加的。

2. 我们还应该坚持里约会议筹备过程至今一直坚持的一个原则、两个基本点。原则就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两个基本点就是人均和历史责任。好多发言者谈到国别平等在当前是不是可以考虑，在国别平等下面再加上人与人的平等，或者说人的权利，我们在这个领域可以举一个人权的旗帜，天赋人权，每个人生下来都有权享有同等的生态足迹，这个权利是不可剥夺的，当然作为现代国际公民在这一权利得到公认的前提下，仍可以自我约束，不必追求用足这个权利，也就是中国自愿地不照搬或者复制发达国家的生活模式、消费模式，在全球承认我们有平等人权的前提之下，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看法来，不是作为我们的责任，而是作为我们的一种自我约束：我们不追求西方发达国家这样的生活方式，不要求达到他们这样的生态足迹，从而达到自己确立我们应有的发展权、又承诺兼顾国际公益的目的。

3. 最后一个是要防，就是防止会议失败谁来承担责任的问题。我们既要坚

持原则、维护利益，但不要轻易说反对，以免为会议的失败承担责任，这是一个总的会议态势问题。

三、关于会议的几个具体问题

对于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环境友好型经济、生态文明等这样一些新兴的口号，无论从中国发展的需要、今后发展的方向，还是从道义制高点的角度，我们都要采取原则上支持的态度，至少不要挑战这种新观念。对观念本身可作我们自己的解释，从而减少其对我们的制约。但对观念之下派生出来的东西，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避免其对我们的制约。

总的来说，因为我们在绿色经济方面实际上做得还是不错的，而且我们最近的五年计划是最绿的五年计划，所以我们在绿色经济问题上可以采取更积极的态度。对绿色经济的内涵，我们可以发挥更多的作用，中国在这方面有好多成功的例子，包括脱贫、粮食自给、再生能源开发等，通过我们的参与来丰富绿色经济的内涵，在这方面可以做一些贡献。

关于美欧之间，路线图与工具箱之争，如能制定实质绿色经济的路线图，制约发达国家，符合全球公益，对我国利大于弊。我们应坚持路线图的制定和实施要体现“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执行路线图，应有不同的模式、不同的指标和不同的时间表。如对新兴经济体制定一套既不同于发达国家又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模式、指标和时间表，只要实际可行，不剥夺我国的发展空间，也不是不可考虑的。总的原则是有路线图可以，但反对一刀切、一套模式、强加于人。

关于资金问题，我们要避免的是承担道义的责任。作为道义责任来说，只有发达国家才有道义的责任，要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资金，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并不具有这个道义责任，无论从人均还是历史责任或发展阶段来说，三个方面我们都不应有道义责任。与此同时，承认我们现在已经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我们愿意做出一定的贡献。这个贡献表现在哪个方面最好？我觉得可以建议成立可持续发展的南南合作基金，我们可以向南南合作基金捐款，出一定的数额或比例的基金，并承诺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适时增加。这样做的好处是既有利于我们处在道义的制高点，也有利于我们获得发展中国家的好评，而且再次确认了我们是南方一员的地位、发展中国家的地位。

关于新型筹资机制，原则上大可不必一概而论地加以反对。但反对借设立新的筹资机制设置新的壁垒，或向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征收同等比例的“税费”。

关于架构问题。焦点是如何加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理事会和联合国环境署。

对此，我们可支持加强联合国有关机构，强调通过改造和加强现有机构，实现经济、社会、环境三者的合一而不是割裂。

对于环境署升格为专门机构，我们拟不反对。

至于设立新的机构，或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与经社理事会关系问题，我本人是“原教旨主义者”，主张回归联合国宪章，通过加强“经社理事会”实现三者合一。环境问题本来就是在经社理事会审议范畴内，只是原先不够突出，可考虑把经社理事会改名为“经济、社会、环境理事会”，同时相应地把秘书处“经社事务部”改名为“可持续发展事务部”。

作者简介



陈健，资深外交家。1942年2月2日出生，就读于复旦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学院，曾在外交部国际司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中国执董特别助理。1992年任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特命全权大使，1994年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外交部发言人，1996年任外交部部长助理，2001-2007年任联合国副秘书长，2007至今任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

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方略看待“里约+20”峰会

章新胜

(生态文明论坛秘书长)

【摘要】“里约+20”峰会的到来促使全世界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在可持续发展的领域来谈三大支柱，对中国来说其实机遇大于挑战。我们中国应学会两条腿走路，发出自己的声音，搭建平台，实现南南合作，南北对话。

我们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方略来看待“里约+20”峰会？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从中国大方针来说，始终坚持贯彻三步走战略，按照小平同志原来的战略，实事求是地说，我国预计到2050年能够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时间上有可能会提前一些，但不会提前太多。

总体来说我们需要一个发展的外部环境，“里约+20”的到来无疑促使全世界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虽然气候变化是另一个轨道，但它也是为当今世界所公认的四大危机之一。

四大危机中，第一个要提到的为金融危机及其带来的全球经济、社会危机。这里所说的社会危机不仅仅是美国津津乐道的、社会媒体宣扬的西亚、北非变局，而是国际社会内部本身存在问题。欧洲整个的社会危机是结构性的，今年达沃斯论坛就此提出来的就是要重新思考资本主义，被称为 Great Transformation（伟大的转变），这种转变指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变局、变化，而是脱胎换骨的变化。所以我们可以认为 Capitalism（资本主义）已经走到头了，将来是不是会出现 Knowledgism（知识主义）或者 Talentism（人才主义），不管用什么语言来说，改革都是必然的。欧洲一些知识界人士认为化解危机，进行改革的方式基本有两种：一是转移矛盾，继续对西亚、北非甚至更多的地方进行渗透或干预；二是内部爆发革命，这种说法可能略显严重，但实际上他们认为欧洲当前所面临的危机不光属于结构性矛盾，也不仅是货币政策同财政政策不一致那么简单。当然我们可以说欧洲面对危机具备一定的自我修复功能，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然而不管怎么说，整个欧洲现在缺乏政治领袖。在亚洲来说，我们的近邻是日本，目前的经济情况也很堪忧。美国的问题就另当别论了。所以说全球关注的，实际上还是经济和社会的危机。

第二大危机就是气候暖化，不管是因人类活动足迹，还是地球大气周期性变

化而起，暖化是不争的事实。连喜马拉雅雪线、南极冰川、北极冰川都在消融，这个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气候暖化又是个放大器，使例如粮食短缺问题等所有的危机都在放大。

第三个问题现在全球公认的就是人口、环境、资源的极限性，全球人口从60亿增长到70亿用时如此之少就是很好的佐证。

第四个危机，西方则谈论较少，即之前被归结为Deregulation（去管制化）或是High-leverage（高杠杆化）等问题，其核心在于回避了一个社会道德，即较少关注Ethic（伦理层面），而这些危机从根本来讲是贪婪造成的。当然在我们的转型社会也有社会诚信的问题！比如食品安全问题，其实反映出整个社会诚信或信仰在某种程度上的缺失。

所以说全球确实正在经历一场大变革、大重组的时代。我们有理由认为在“里约+20”到来之际，在可持续发展的领域来谈三大支柱，对中国来说其实机遇大于挑战。

第二个分析，我们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到今天如何与时俱进，是左右还是前后的问题，是逢源还是被夹击的问题来阐述。我认为我们在政府层面长期搞应对，在知识层面长期搞解读，无法把自己的东西向世界全面推广，总不是一个好的方针。所以“里约+20”会议，全世界可以不承认存在中国模式，但得承认有一个中国道路。中国毕竟在最短的时间解决了五亿人的脱贫问题，而且我国农民城镇化不是以农民大量丢失土地，类似“圈地运动”来实现的，诸如循环经济、良性社会、生态文明等，总之我国没有完全陷入到西方那种完全依靠低碳等发展轨道上去，非洲一些国家吃亏也是吃亏在完全照搬西方模式上。

第三个问题想分析一下四大集团利益。首先是以美国为首的美加，北美希望搞一个简略报告，发展中国家做出最后决议，希望搞一个综合报告。总体来说，我国还是要守住共同有区别的责任，这是实事求是的一个体现，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考虑“两条腿”走路。

（1）我们要学会两手对付两手，官方是一手，非官方和民间也是一手，那么我们过去官方这手比较硬，但是现在大家就盯着中国，非官方这一手好像还不够。怎么样整合非官方的所有的积极性是需要考虑和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2）发出中国的声音，解释中国的理论、责任、行动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不只单枪匹马来做，而要同其他国家尽可能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设法联合一些国家，不光是南南合作，要同联合国的一些机构，还有一些国际上能被我们所借用的力量一道合作，我们知道官方立场是很难改变的，所以我觉得在非官方的层面上可以做这个事情。

（3）我们要对“里约+20”寄予很大期望，期待它有所突破。“里约+20”重

点就是两句话：一个是绿色经济；一个是治理。那么绿色经济这件事情，从中国的最大利益来说，我们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地步，绝不能再次丢弃，因为绿色经济是我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不单是北京，很多城市的上空都有大雾，另外，水资源短缺现象也极为严重。由此可见，绿色经济本身是我国寻求发展的阶段性需求。那么怎么能改变我国在三年前落后挨打时期起形成的褐色经济，在绿色经济问题上有所作为呢？科学家归纳 20 世纪的三大科学重大发现，在 21 世纪前 50 年基本是以新技术层出不穷来展现的，所以技术的更新，特别是颠覆性技术替代所有现有技术，所以说绿色经济的实现一方面要对现有经济进行改造，另一方面针对技术进步的现实，在当前这个资讯社会，我们还要尽快建立相关的信息平台。

第二件事就是治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治理模式建立之时起，基本上是以 Anglo-saxon 模式为主体，我觉得全世界，包括整个联合国体系以及半联合国性质的世界银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基本上都是 Anglo-saxon 占主体。德国曾试图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建立自己的系统，但是基本没有成功。

中国还是 ECOSOC（经社理事会）成员，所以在体制问题上要相当地慎重。首先我们应该在体制内的问题上，要占有一席之地，不论它怎么动。

第三个建议，我们不仅要考虑“里约+20”这几天的会议，还要考虑超越“里约+20”。在联合国体制内，我们只要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在联合国体制外，我们应该融合所有的统一战线力量，建立一个非正式的平台，这样始终可以把握有关绿色经济所有技术的新信息。一直以来西方国家出资建立达沃斯论坛等，用非正式的方式引领相关领域的议程，我认为我们现在也可以着手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了。这主要集中于民间、非官方，也就是说不走政府渠道，而且需要团结一些国家，比如基础四国等，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共同有所作为。现在中国主动出面牵头对 G77 也有好处。根据零报告所写，第一件事就是要“建立一个知识共享的平台”。“知识共享”包括两件事：其一，政策规划，其实我们利用“中国道路”中的很多东西帮助非洲国家、东盟国家做事情，这些国家还是觉得中国的办法更实用，而且比较经济实惠。西方的办法有两个缺陷：第一是带条件，第二是西方老早就后工业化了，所采取的方式并不贴近上述国家的国情。所以就政策规划来说，我们中国不可能拿多少钱给他们，但是我们中国好多方法是可以和他们分享的。其二，有一套工具箱。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道德高地来占领，我们在体制外来完成合作。

我们搭建这样的平台，实现南南合作，南北合作。可持续发展的议题，生态环境的议题，这是可以谈一百年的题目，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事情。

作者简介



章新胜，现任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生态文明论坛秘书长、天合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曾到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并取得城镇规划设计学专业硕士学位，并获美国、俄罗斯等国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曾任教育部副部长，第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自2003年起，当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世界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副主席、亚洲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中国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

“里约+20”峰会后全球绿色低碳发展趋势及我国对策

何建坤

（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

【摘要】 “里约+20”峰会通过《我们希望的未来》成果文件，将对未来全球可持续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并将进一步促进全球绿色低碳的发展趋势，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也将面临新的挑战 and 机遇。

一、“里约+20”峰会及其成果的启示

本次峰会有两个主题：其一是在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框架下发展绿色经济；其二是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这两大主题凸显了当前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未来的趋势。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三者互相依存，相辅相成，需要统筹协调。当前，世界可持续发展既面临南北差距扩大的问题，全球仍有 1/5 的人口处于极端贫困之中，面临饥饿、贫困、饮水安全、公共卫生和健康等多方面的挑战，发展经济、摆脱贫困，仍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首要和压倒一切的优先任务；另一方面，世界也面临以全球气候变化为代表的全球环境问题的挑战，气候变化贯穿各个领域，是持久存在的危机，威胁所有国家的延续和生存，国际社会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原则和规定，采取雄心勃勃的紧急行动，也是本次峰会文件中的重要共识。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核心是减少人为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其中主要是减少化石能源消费的 CO₂ 排放。本次峰会成果文件中重申全球控制温升不超过 2℃ 的目标，并强调各国就到 2020 年全球每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所做的减排承诺的总体效应与有可能把全球平均温度维持在高于工业化以前水平 2℃ 或 1.5℃ 之下的总体排放路径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呼吁各国加快步伐，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因此，发展绿色经济，实现低碳发展，将成为全球促进经济发展、消除贫困和保护全球环境目标之间统筹协调的战略选择和根本途径。

在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下发展绿色经济，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挑战，需要开展广泛深入的国际合作，也需公正有效的国际制度保障。发达国家的人口仅占世界人口 20%，以占历史上全球自然资源消费的 60%~80% 为支撑，实现了其工